

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

卜祥记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

卜祥记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卜祥记著. —北京:商务
印书馆, 2015

ISBN 978-7-100-07550-3

I. ①青… II. ①卜… III. ①青年黑格尔派—
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①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 第 23852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

卜祥记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7550-3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41 3/4

定价:180.00 元

序 言

余 源 培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青年黑格尔派的研究是相对滞后的,关于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哲学革命之内在联系的研究,更是一个亟待深入的重大理论问题。在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研究众说纷纭的今天,把青年黑格尔派作为理论切入点,细心梳理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的心路历程,对于较为准确地解读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质所在,推进新时期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深入研究,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前沿性研究课题。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质何在?这是理论界正在热烈争论的一个具有本质重要性的问题。遵循着对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一系列重要文本的不同解读路径,也形成了各种有代表性的不同观点。应当说,这是一件好事。它表明:马克思哲学在历经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依然焕发出勃勃生机,具有鲜明的当代性意义。

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意义,本质上根源于马克思哲学自身广阔而深邃的理论内涵;也就是说,它的当代性意义,并不取决于任何一种在形式上和时间上具有所谓当代性质的解读方法,不是用某种最时髦的理论视角去诠释马克思历史文本的解读结果。本质地说来,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意义,就蕴含在马克思的哲学文本中,一切解读路径都只具有外在的参照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不否认国内哲学界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等解读方法的意义和价值;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认为,这些不同的解读方法对于深入挖掘马克思哲学文本的潜在内涵,呈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质和当代性意义,是非常有帮助的。

但是,问题在于:当试图借助于某种理论参照物去呈现马克思哲学革命本质所在的时候,必须有一个最为切近的理论切入点。我们认为这个切入点就

是青年黑格尔派问题。

关于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内在关系,我以为,虽然可以借用一些当代性的理论路径深入挖掘、解读马克思的哲学文本,但是所有这些借鉴都不可以离开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的本真历程。而对于这一历程的本真呈现来说,青年黑格尔派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理论环节。从柏林大学时期以及博士论文的写作,到《莱茵报》时期开始投入现实的政治斗争;从《莱茵报》后期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怀疑与动摇,到克罗茨纳赫和《德法年鉴》时期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初始批判;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新世界观的萌芽,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新世界观的草创,并初步构建出全新的哲学境域,在这尽管并不太长但却极为重要的10年间,马克思思想的每一重要进展都是与以施特劳斯、鲍威尔、卢格、费尔巴哈、赫斯、施蒂纳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演进,与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立场的接受、背离和批判分不开的。正是青年黑格尔派主要成员的哲学历程,给我们提供了理解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的思想背景,提供了深入解读马克思哲学革命文本的直接的和间接的理论针对性,提供了把握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论高度和本质意义的最为切近的理论切入点。抛开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关联,是无法真正领会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发生及其本真意义的。

因此,当卜祥记同志就博士论文的选题征求我的意见的时候,根据他的基本学术素养,我向他郑重推荐了这个有较大难度的重要选题。值此博士论文即将出版之际,我认为他很好地完成了这一研究课题。正如答辩委员会一致认可的那样,无论从理论深度还是从篇幅来看,摆在我们面前的《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一书都是具有理论内涵和学术深度的一部力作。再次浏览全书,我感到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作者的理论创新意识:

第一,本书的最大创新之处体现在对马克思哲学革命文本解读方法的创新。全书努力贯彻“让历史出场”、“让文本自己说话”的原则,把我们通常运用的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梳理思想史的基本原则真正落实到实处。

逻辑和历史统一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倡导并灵活运用思想史研究原则,但当我们具体运用这一基本原则的时候,却常常不自觉地带有文本解读者自己过多的主观随意性,表现为“逻辑”因素对“历史”过程的“侵犯”,因而并不能真正做到本真地呈现“思想的历史”。这是人们经常意识到的一个问题。但是,如何界定“逻辑”对“历史”的“合理整合”与“逻辑”对“历史”

的不合理“侵犯”之间的界限,我们却缺乏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基本理念和由这一理念所生发出的方法。实际上,这一问题也正是“诠释学循环”所要表达的本质的东西。

作者在本书所提出的“让历史出场”、“让文本自己说话”的原则,就是对超越“诠释学循环”的一个重要尝试。它既是一个努力贯彻“逻辑和历史统一”原则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基本理念,也是一个本真地呈现思想史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方法。

就其作为基本理念来说,作者对“文本”和“历史”做出了新的解释。在作者看来,在一般意义上,思想的“历史”是由“文本”体现的,一个个前后相继的“文本”构成了思想史的历史演进。但是,仅仅看到这一点还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我们还必须同时意识到:“文本”本身也是“历史”的。

所谓“文本本身也是历史的”,包含两层含义:在其最为直接的意义上,是由于“文本”是文本所直接表达的作者本身思想“历史”的一个构成环节,正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历史发展的一个构成环节一样;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局限于这一层含义,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说出更多的东西,因为在这个意义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是马克思哲学革命历史中的一个有待于通过被解读才能说话的东西。因此,在其更为本质的意义上,“文本本身也是历史的”同时还意味着:文本同时还处于被解读的历史序列中,是文本解读历史序列中的文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本才真正变成了活的东西;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让历史出场”、“让文本自己说话”才是可能的。

在这个意义上,“文本本身也是历史的”,最终所要表达的实际上就变成了这样几个依次递进的内涵,即:(1)作为实物形态的文本的历史,即该文本在文本作者前后相继的一系列文本序列中的前后关联;(2)该文本作者对该文本的历史解读,即文本作者创作该文本的历史针对性、它的历史渊源等;(3)后人对该文本的解读历史。

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本质地说来,“诠释学循环”的症结在于:其一,按照诠释学的基本要求,诠释者应当客观地诠释文本,但由于诠释者的先入之见,又决定了他不可能做到绝对客观;其二,诠释学主张从整体出发诠释部分,但对整体的把握又依赖于对部分的诠释。这实在是理论上的两难境地。但是,这种两难境地并不是不可超越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换一个思考问题的视角。正如海德格尔曾经指出的那样,这种循环并不是我们非得要排除的不幸的循

环,而是人类理性所面对无法回避的现实。

在这里,我们首先必须区别“文本”与“文本的意义”。毋庸置疑的是:文本是存在的,但是只要谈到文本的意义,它的意义就始终是针对特定诠释者的意义,是文本与诠释者的“思维前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我们抽掉了文本诠释者的存在,文本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因此,“让历史出场”、“让文本自己说话”或者对“诠释学循环”的超越,首先就表现为引入“第二个(甚至第三、第四个)自我”、对文本诠释者“理论前见”的反思。

为了做到这一点,作者对“第二个自我”的意义给予了解释。在作者看来,“第二个自我”的引入,直接地说来,它似乎仅仅意味着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的自我反思。但是,实际上,在这里本质诞生的乃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类思想的历史维度,是对人类认识的历史根基的反思与呈现。因为,当人们对解读文本的前结构进行必要反思的时候,当下的文本是作为历史的环节出现的;或者说,在“第二个自我”的视域中,作为其反思对象的解读文本的前结构与将要给予解释的当下文本恰好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序列。由于这种前结构不仅包括了后人已经进行过的对该文本的历史性解读,而且也包含了人们常常没有意识到的文本的“前史”,即文本的诞生历史、文本作者对文本的解读历史,或者更准确地说——包含了创作的整个历史背景和历史针对性,因此,“第二个自我”的引入实际上意味着该文本的整个历史的逐步呈现。在这个意义上,“让历史出场”,“让文本说话”,就不再是直观而言的仅仅局限于文本本身,而是把当下所要给予解释的文本,本质地看成完整历史序列中的一个环节;“让历史出场”,“让文本说话”,就是让当下文本回归本原的历史序列中,让当下文本在其历史地生成的历史序列中呈现出来,即历史地呈现出它的生成历史——它的历史源头、它对历史源头的汲取与超越。

就马克思哲学文本的解读来说,引入“第二个自我”,“让历史出场”,“让文本说话”,就是把马克思的哲学文本置归于它本原于并本质地超出于其中的近代形而上学、思辨哲学的境域中,呈现马克思哲学文本的历史维度,即它的生成历史。由于这一历史包含了文本的前史、文本本身的历史、文本的解读历史等宏大的历史叙事,因而这一历史也就超出了单纯的历史叙事而同时又是逻辑的历史。

由此一来,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不仅真正落实到了实处,即不仅澄清了“文本”、“历史”的完整性,从而可以更有效地避免逻辑整合的主观随意性,避免

“逻辑”对“历史”的“侵犯”，更好地再现文本的内涵，而且同时也很好地实现了作者研究方法与研究课题的有机融合。因为当作者把“让历史出场”、“让文本说话”作为“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哲学革命”研究基本方法的时候，这种方法决不是外在的可有可无的点缀。“让历史出场”、“让文本说话”，本质地就要求着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的历史再现，即要求着把对青年黑格尔派的研究作为呈现马克思哲学革命本质的基本路径；反过来说，本真地呈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质，也必然要求着“让历史出场”，“让文本说话”，并因而在“文本”、“历史”的完整意义上要求着把对青年黑格尔派的研究作为解读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文本之本真内涵的内在要求和题中之意。

正是由于作者在课题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因而在课题的研究过程中，不仅有对于资料的比较全面的占有，更有对众多材料的辨析；不仅有重大历史场景的描绘，更有众多重要细节的发掘和阐发；不仅有对于观点的旁征博引，更有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客观逻辑通过“让文本说话”、“让历史出场”的自主呈现，并因而在课题研究内容上体现出丰富的具有见解的理论观点。

第二，就研究内容的创新而言，值得指出的有以下一些方面：

全书以实体与主体的关系为主线，围绕着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态度，通过宗教批判、政治批判、社会批判、经济批判和哲学批判的理论起点和理论界限的全面分析，展示了青年黑格尔派诞生、发展、分化与解体的历史进程，揭示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本质所在。

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作者仔细研读了青年黑格尔派主要代表人物的主要著作，对于以往理论界较少关注的施特劳斯、鲍威尔、卢格、施蒂纳等人的基本思想，给予了尽可能的研究；对于学者们已经做过研究的一些人物，如费尔巴哈，作者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研究见解。作者认为，尽管费尔巴哈是以其宗教批判获取盛誉的，但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出发点、内在精髓、落脚点和理论高度、理论界限则是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应当把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作为理解费尔巴哈理论重要性的本质所在，他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影响也正是在哲学批判的意义上发生的。对于作为费尔巴哈批判理论精髓的哲学批判在何时真正地影响到马克思批判理论的进展，作者通过对一系列历史文献的考证，认为这种影响只是在1843年初，在马克思已经独立达成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怀疑和批判态度的前提下才真正开始的，而且自此之后，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一直是在哲学批判的意义上发生的。另外，对于作为费尔

巴哈理论核心的哲学批判对马克思发生影响的本质所在,作者概括为费尔巴哈通过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所提出的“感性对象性原则”以及由这一原则出发所提出的对人的社会存在的诉求,它同时也构成费尔巴哈哲学批判所达到的理论高度和最终的理论界限。在费尔巴哈之后,一切可能的哲学革命的发生,都必将表现为对费尔巴哈“感性对象性原则”的本质超越。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要性本质地凸显出来;从这一重要手稿开始,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的思想行程始终是把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与对费尔巴哈的内在的和直接的批判,与对实际上已经远远地落在费尔巴哈之后的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的深刻批判结合在一起的。由此,青年黑格尔派在马克思哲学革命历程中的重要性被本质地凸显出来。

在宗教批判、政治批判之后,自克罗茨纳赫,特别是自《德法年鉴》开始,马克思批判工作的重点转向社会批判、经济批判和哲学批判。作为本书的重点,作者围绕这三大批判,展开了马克思逐步实现哲学革命的宏大历史叙事。作者强调,在这三大批判中,经济批判的转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哲学批判是三大批判的核心,而社会批判则是马克思所有批判工作的最终归宿。这种基本的批判理论框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鲜明地呈现出来,而且正是该手稿通过“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本质开辟出的“感性活动”的哲学境域,提供了理解马克思经济批判和社会批判之实质的钥匙,包含着本质超越思辨哲学的一切可能性和基本路径,构成重新评价和解读《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的理论出发点。

作者强调,“感性活动”原则是理解马克思逐步实现的哲学革命的根本理论平台,传统意义上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划分以及在这一学科划分基础上所构建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众多构成要素,都必须在“感性活动”的理论平台上给予新的解读。作者认为,“感性活动”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哲学境域,是对思辨哲学的根本超越,是对思辨哲学根基和来历的追问,是生活根基的呈现。在“感性活动”的全新哲学境域中,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重要组成的实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产主义等等概念,将呈现出全新的内涵,它们本质地区别于在近代形而上学视域中曾经赋予的种种理解。

作者认为,创立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最伟大的理论贡献。马克思的唯物

史观既是哲学的、经济学的，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作为哲学，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致力于通过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的批判，呈现思辨世界的现实根基；作为经济学，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致力于对国民经济学思辨哲学前提和思辨哲学本质的批判，展示思辨经济学所描述的人的经济生活世界的现实异化，呈现人的本真生存世界；作为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致力于对人类生存命运的关注，揭示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未来。总之，马克思的哲学批判是马克思哲学唯物史观的基础和核心，经济批判是马克思批判工作的着力点和充分展开，而社会批判，即对人类历史命运的关注则是马克思所有批判工作的归属、灵魂和落脚点。他们在本质上是不可分离的整体。

贯穿于本书的上述基本理解思路和观点，来自于作者对待马克思哲学文本的“让文本自己说话”的解读，来自于对大量文本的细致性研究和大量资料的分析，力图让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本真地出场。因此，在本书中，我们看到了对相关文本的大量引述，并在这种引述中贯穿了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重要著作的认真研究和独到理解。其中，尤以对《神圣家族》重要地位的评价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并不再仅仅局限于第一章的全面性解读，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

作为我的博士生，卜祥记同志在三年来的学习研究过程中，付出了艰苦的劳动，逐步形成了对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的比较系统的理解。在他的学习研究过程中，多方面得益于吴晓明教授、王德峰教授、孙承叔教授的教诲。尽管我并不完全赞同他的一些看法，但他严谨、求实、刻苦、专注的治学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学术界可能会对他的一些见解提出不同看法，但这项研究本身对于推进马克思哲学革命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的意义却是不可忽视的。

目 录

导 言 让历史出场	1
第一篇 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前提	25
第一章 “先验自我”的构建与哲学、宗教的划界	28
第一节 “先验自我”的构建	29
第二节 哲学与宗教的划界	33
第二章 “绝对自我”的逻辑设定与理性主义的道德宗教	37
第一节 消解“先验自我”独断论成分的“绝对自我”	37
第二节 理性主义道德泛神论的宗教哲学	40
第三章 实体与主体无差别的同一与启示神学	43
第一节 作为直接真理的实体与主体的“绝对同一”	44
第二节 非理性主义浪漫主义的启示神学	48
第四章 实体与主体、哲学与宗教的思辨统一	52
第一节 实体即主体	53
第二节 泛逻辑主义的宗教哲学	60
小结 黑格尔哲学的解体	71
第二篇 青年黑格尔派的诞生与发展	75
第五章 作为一个学派的青年黑格尔派	80
第一节 知识考古学语境中的政党界定与青年黑格尔派	81
第二节 知识考古学语境中的政党、派系与青年黑格尔派	85
第三节 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政治主张与党派	89
第六章 施特劳斯的实体哲学	92
第一节 实体哲学的宗教背景	92

第二节 “神话说”的实体哲学	99
第三节 实体哲学的反响	117
第七章 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	123
第一节 基督教的哲学基础	126
第二节 基督教的起源	135
第三节 宗教异化论	150
第八章 马克思自我意识哲学立场的宗教批判	172
第一节 从康德到黑格尔	173
第二节 自我意识的哲学立场及其潜在的张力	193
小结 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世俗化	222
第三篇 青年黑格尔派的分化与解体	225
第九章 宗教批判的政治化	229
第一节 从实体哲学出发的短暂的自由主义宗教批判	232
第二节 以自我意识哲学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政治批判	236
第三节 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怀疑与民主主义的政治批判	243
第四节 马克思与卢格的决裂	250
第十章 从宗教批判到政治批判	257
第一节 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	258
第二节 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	264
第三节 从“自我意识”到“人民理性”	269
第四节 对黑格尔哲学的怀疑与动摇	274
第十一章 从宗教批判到哲学批判	285
第一节 从黑格尔的学生到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者	288
第二节 神学的秘密就是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秘密	295
第三节 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深入批判	318
第四节 费尔巴哈与施特劳斯、鲍威尔的哲学之争	336
第十二章 从政治批判到社会批判	356
第一节 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本质影响	359
第二节 作为现象层面的社会批判与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 初始批判	384

小结 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怀疑与批判·····	423
第四篇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429
第十三章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与新世界观的萌芽·····	432
第一节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434
第二节 对国民经济学前提的哲学批判·····	470
第三节 对“共产主义”思潮的哲学批判·····	487
第十四章 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初步清算与新世界观的初步归纳·····	522
第一节 “三大批判”的推进与“感性活动”的新进展·····	525
第二节 作为批判核心的哲学批判与“感性活动”的具体化·····	538
第十五章 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彻底批判与新世界观的草创·····	573
第一节 对施蒂纳批判的批判·····	574
第二节 对费尔巴哈的清算·····	604
第三节 新世界观的草创·····	623
小结 全新的哲学境域·····	639
参考文献·····	645

导言 让历史出场

马克思哲学生一个半世纪以来,对马克思哲学革命之本质何在的历史追问,一直是一个长盛不衰的核心话题。对于一个在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进展方面,没有任何一个思潮可以与之相比拟的哲学学说来说,这一话题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本质重要的。

因此,在现象层面,我们看到了自“第二国际”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马克思哲学革命之本质的不同解读,看到了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自己所面对的实际问题时对“实践唯物主义”的热烈讨论,也看到了几乎每一种有影响的哲学思潮和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反思,看到了多种多样的当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诸如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等。

然而,当我们真正深入到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核心话语中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质何在,始终是每一马克思主义思潮不可回避的理论原点,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解读本质地根源于对马克思哲学革命本质的不同理解;那些在以“马克思”命名的“主义”上附加了多种多样“别名”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思潮,说到底都不过是基于马克思哲学革命之已见的“衍生物”。

在这里出现的乃是准确把握马克思哲学革命之本质的诉求,是对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的真实历史过程的探索,是“让历史出场”的必要性。

一、对马克思哲学革命本质所在的探索,要求着“让历史出场”

“让历史出场”,本质地表现为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真实历史过程的历史呈现,表现为让作为这一历史存在的马克思哲学文本自己出场说话。这是马

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中的理想追求。但是,真正地说来,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这又是不可能绝对实现的追求。因为,任何文本的自身呈现都必须通过不同接受者的解读才能完成,而对于既是文本的接受者又是文本解读者的人来说,他的解读和接受本身却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思维过程,也绝非一个空白的理论场,解读和接受的过程本质地依据于作为“思维前结构”或“前见”的特定哲学境域;这种“前见”笼罩着被解释的对象,常常把对被解读对象的解读无意识地、强制性地纳入既有的哲学境域。当一些“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在马克思的哲学文本中仅仅读到“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的时候,在这里出现的实际上是近代形而上学的哲学境域,是近代形而上学境域中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①;当卢卡奇、柯尔施十分坚决地“反对普列汉诺夫和梅林的‘正统’”的时候,他们的哲学基地依然深陷于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境域中;当“实践唯物主义”的论争在国内理论界激烈展开的时候,对“实践”的理解就如海德格尔所误解的那样,依然在根基上滞留于“主客二分”旧哲学的思维框架中^②;至于立足于当代性理论视域中的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大多不过是历史上的形而上学、思辨哲学的当代形式。这种当代性的理论视域,或者直接地延续着近代意义上的思辨理性,或者在现象上表现为对思辨理性之当代意义,即对当代科技理性的激烈批驳;但是,本质地看来,马克思在思辨哲学、形而上学根基处所实现的伟大变革却始终是被错失了,马克思的哲学文本始终是披着近代形而上学的外衣出场的;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① 实在地说来,我们不应苛求前人。对马克思哲学革命文本的解读,只能是而且本质地就是历史性的。考虑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全文)只是在1927年才发现,并直到1932年才正式发表,因而我们实在是应当惊讶于梅林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广阔视野和渊博的学识。梅林,也包括“第二国际”的其他理论家以及已经读到科尔纽《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人,他们在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传记以及其他著作中对马克思哲学革命文本的历史解读,特别是围绕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所涉及的有关青年黑格尔派的大量背景资料和相关文本的介绍,在今天看来,依然是非常有价值的。

^② 在谈到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时,海德格尔提出:“[让我们]来考察以下这个论题: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对立?难道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已经是对世界的改变了吗?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预设了,解释是一种真正的思之事业吗?另一方面,对世界的每一个改变不都把一种理论前见(vorblick)预设为工具吗?那么,在马克思那里谈到的是哪一种改变世界呢?是生产关系中的改变。生产在哪里具有其地位呢?在实践中。实践是通过什么被规定的呢?通过某种理论,这种理论将生产的概念塑造为对人的(通过他自身的)生产。因此马克思具有一个关于人的理论想法,一个相当确切的想法,这个想法作为基础包含在黑格尔哲学之中。马克思以他的方式颠倒了黑格尔的观念论,这样他就要求给予存在先于意识的优先地位。……对于马克思来说,存在就是生产过程,这个想法是从形而上学那里,从黑格尔的把生命解释为过程那里接受来的。生产之实践性概念只能立足在一种源于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上。”参见F.费迪耶等辑录:《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第53页。

因此,纵观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历史解读,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历史并未真正出场。由于作为诠释者和接受者之理论前见的特定的近代哲学境域,在这里出现的并不是作为原初意义上的马克思哲学革命,并不是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的本真的历史,而是思辨哲学境域中的马克思哲学革命,是近代形而上学视域中的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由此一来,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不仅再度被强制性地推回到他所本质超出的近代形而上学的哲学境域中去,而且由于思辨理性的当代意义,即科技理性的霸权地位,这种近代形而上学、思辨哲学境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空前巩固的形式不断地被建构起来;由此一来,“让历史出场”的必要性就空前强烈地凸现出来,让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历史过程历史地呈现出来,就成为最具当代性的研究课题。

二、“让历史出场”本质地要求着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的历史再现

当我们一般性地讨论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形而上学遭遇的时候,讨论着这种遭遇的诠释学根据的时候,如何让马克思的哲学文本自己出场说话,就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让历史出场”,让马克思的哲学文本自己出场说话,在方法论上就变成了对“诠释学循环”的历史超越。

本质地说来,“诠释学循环”的症结在于:其一,按照诠释学的基本要求,诠释者应当客观地诠释文本,但由于诠释者的先入之见,又决定了他不可能做到绝对客观;其二,诠释学主张从整体出发诠释部分,但对整体的把握又依赖于对部分的诠释。这实在是理论上的两难境地。但是,这种两难境地并不是不可超越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换一个思考问题的视角。正如海德格尔曾经指出的那样,这种循环并不是我们非得要排除的不幸的循环,而是人类理性所面对的无法回避的现实。我们只有在“诠释学循环”中才能找到让文本自己说话的真正出路。

在这里,我们首先必须区别“文本”与“文本的意义”。毋庸置疑的是:文本是存在的,但独立的、与人无涉的文本却是没有意义的;只要谈到文本的意义,它的意义就始终是针对特定诠释者的意义,是文本与诠释者的“思维前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我们抽掉了文本诠释者的存在,文本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对此,黑格尔站在“实体即主体”的思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在《精神现象

学》中亦早有论述。^①

如此一来,一个非常显然的事实就是:文本之绝对客观的意义似乎就是不存在的了。那么,让文本自己出场说话又是如何可能的呢?或者说,对文本的客观解读是不是可能的,出路何在呢?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是只在今天才由人们提出来的;至少当康德从事先验批判的重要工作时起,这个问题就已经进入哲学家们的严肃思考中;而且,正是在康德哲学中,在作为其先验哲学本质特征的先验批判中提供着超越“诠释学循环”的重要启迪:在深入文本解读之前,我们首先应当对解读文本的“思维前结构”或“前见”进行必要的反思,即引入“第二个自我”,甚至于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必须引入对作为“第二个自我”的“理论前见”作进一步反思的“第三个自我”。当黑格尔提到“如果有人觉得在哲学里在开始研究事情本身以前,即在研究关于绝对真理的具体知识以前,有必要先对认识自身加以了解,即是说,先对人们借以把握绝对的那个工具,或者说,先对人们赖以观察绝对的那个手段,加以考察,这乃是一种很自然的想法”^②的时候,这种“很自然的想法”就是针对康德的先验批判方法以及这种方法所包含的对超越“诠释学循环”的启迪而言的。

当然,这种方法遭到了黑格尔的批评,被黑格尔称为理性的“诡计”,认为“这种补救的办法,事实上只能把我们引回到我们原来所在的地方去”,并不能“获得关于绝对的纯粹真理”。^③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这种批评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发生的,而是针对康德已经先验地预设了作为前提的认识与绝对的分裂,即“相信在认识与绝对之间存在着一条划然区别两者的界限”^④而言的。因而,黑格尔的批评并不意味着对引入“第二个自我”、对文本诠释者“理论前见”进行反思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全盘否定。实际上,在黑格尔庞大的哲学体系中,尤其是在作为黑格尔哲学的“秘密”和“诞生地”的《精神现象学》以及在《逻辑学》等主要著作中,“第二个自我”恰恰是不断出现的批判和反思的主体;

① 黑格尔指出:绝不可以把“绝对”与“我”对绝对的认识分离开来,绝对就是在我之中的绝对,“如果我们研究我们将其想象为一种媒介物的认识,从而认清了这媒介物对光线的折射规律,然后把光线的折射从结果里抽除出去,那么这样地抽除折光作用的办法也完全是无用的;因为认识不是光线的折射作用,认识就是光线本身,光线自身才使我们接触到真理,而如果光线被抽除出去,那么,指点我们的岂不只剩下一个纯粹的方向或空虚的地点了吗?”参见《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6月第2版,第52页。

②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第51页。

③ 同上书,第52页。

④ 同上书,第51页。